



▲ 罗素与中国学者的合影。

【短史记】

百年后回看“罗素访华”： 本想“开药方”，无奈身陷漩涡

□九雨农

1920年10月12日，英国人罗素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
对于罗素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陌生。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，罗素因为他在数理逻辑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和他在和平主义运动等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举，在西方世界早就名声大震。

此次他前往中国，是应梁启超的邀请前往北京大学担任讲师，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中国。

罗素的到来，让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。彼时的中国，刚刚经过了“五四运动”的洗礼，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找能救国救民的良方，罗素的思想特别符合当时进步人士的口味。著名哲学家张崧年曾说“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的根本、现代的病原的，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本上下手，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”。这种“激进”的思想，让很多“五四时期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视罗素为“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”。

正因为如此，国人给了罗素最高的礼遇。虽然罗素刚到中国时，因双方没有做好沟通，这位哲学家在码头吃了“闭门羹”。但很快，中国人便以自己的热情驱散了罗素的不满。在上海，罗素被安排到了当地一所著名的旅馆。当天晚上，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，并称他为“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”，如此称呼自然让罗素欣喜不已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仅仅是个开始，在第二天举行的欢迎晚宴上，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各位“大佬”，如蒋百里、孙伏园、瞿世英等均到场为罗素接风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更是主动请缨，担任罗素的翻译。

如此安排，让罗素感到受宠若惊。在宴会上，罗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。后来，演讲的内容被翻译后刊登到《申报》上，编辑为其取的副标题为《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》，这篇稿子可谓捅了“大娄子”，引发了舆论的大讨论。

之所以如此，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关。如今，我们常常用西方的“文艺复兴”或者“启蒙运动”比拟新文化运动。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“现代文化”，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，而是充满“理性”的“西方文化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让中国摒弃传统“全盘西化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就不难理解罗素的观点当时为何让人觉得“惊世骇俗”。

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作人。他在1920年10月17日的《晨报》上刊发了《罗素与国粹》一文，劈头就说：“罗素来华了，他第一场演说，是劝中国人要保护国粹，这必然很为中国人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……但我却不能赞成”，并直言罗素“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”。

周作人的文章在喊出了激进知识分子心声的同时，也让罗素陷入了尴尬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罗素的争议越来越大，这给罗素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有鉴于此，罗素的一些好友准备“反击”。张崧年指出，《申报》所刊登的消息，是一篇失实报道，认为《申报》断章取义，报道的内容与罗素原意相去甚远——罗素的意思是国人要有创造的精神，应警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，像中国传统艺术一类的好东西应当保留，而以“保存国粹”归纳罗素的演讲，极容易误导大众。张氏兄弟的辩解，暂时平息了

关于罗素的争论。但是对于激进派的知识分子来说，罗素再也不是那位“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”了。

虽然处在舆论议论的焦点，但是罗素本人并没有为争论而分心。在上海做完“热情洋溢”的演讲后，他又前往了杭州、南京、长沙等地。在长沙，他连续作了四次“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”的演讲。

在史学界，一般把罗素的这四次演讲，视作“基尔特社会主义”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。所谓的“基尔特社会主义”，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，它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手段只能是“过度”，而不是“革命”，因此并不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。罗素的四次演讲，就阐释了这些思想。他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，是进行政治改革，通过发展实业、兴办教育等措施，让老百姓富起来，尽早实现自立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罗素的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议，支持者如梁启超、张东荪等，认为罗素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不过，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，代表人物为陈独秀、李大钊等，他们洞察到了“基尔特社会主义”的本质，并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。

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，吹捧“基尔特社会主义”的人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改良，其实质与“洋务运动”“戊戌变法”等运动并无区别。正如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指出的，罗素的主张“事实上做不到”，历史已多次证明，试图以改良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是行不通的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，才能拯救中国。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。

这场“社会主义的论战”，使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，一真一伪、泾渭分明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。受论战的影响，许多人开始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罗素这次演讲，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

再说回罗素。来华还不到两个月，便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，罗素心中着实不快。但让他更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，1920年10月底，罗素来到北京大学，讲学社给他的待遇，虽然比原先约定的要优厚，学校也成立了“罗素学说研究会”对其表示推崇，但是他始终找不到快乐的感觉。原因便在于，他很难找到知音，在北京大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胡适，对他非常抵触，而另外两位北京大学教师——陈独秀、李大钊，与他的观点不一样，而这三人在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，连带着学生对其也“不感冒”。

到了1921年7月，罗素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日子。他迫不及待地买上回英国的船票，希望早日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，他在欢送会上，作了《中国走向自由之路》的演讲。这次，他再无保留，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。说完之后，一代大师罗素飘然而去。

回顾这十个月的经验，很难说罗素在中国过得愉快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。回国之后，他出版了《中国问题》一书。书中的观点当时看很“匪夷所思”——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，罗素就预言中国必将崛起，并且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。他期待梁启超笔下的“少年中国”，在把强敌扫地出门时，也能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“温文尔雅，恭敬有礼之风，率真平和之气”。

【人物志】

钟肇政和《鲁冰花》，跨越一甲子的写作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著名作家钟肇政于5月16日去世，享年96岁，他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《鲁冰花》。

《鲁冰花》是很多80后“看过也哭过”的电影，影片结束时，天才小画家古阿明墓前燃烧的那张获奖证书痛灼着观众的心，当罗大佑用嘶哑的嗓音喊出“夜夜想起妈妈的话”时，观者早已泪湿衣襟。在电影人杨立国、吴念真的影视化改编下，原本干净、犀利又伤感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，又被赋予了特有的细腻和清新。《鲁冰花》于1989年上映后，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记忆，它的片尾曲《鲁冰花》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后，更是传唱至今。

《鲁冰花》是钟肇政1960年发表的个人首部长篇小说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社会开始转型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在陈映真、刘国松等人的引领下呈现新活力；1963年琼瑶写出处女作《窗外》，通俗文学开始风靡；钟肇政等作家则把锐利的笔锋对准了社会真相面进行书写，在《鲁冰花》中，一个有着绘画天赋的乡村儿童的夭折，被放在了社会大背景中进行书写。鲁冰花在台湾方言中是路边花的谐音，古阿明和姐姐古茶妹两个孩子，在小小年龄就遭遇复杂的社会人情。因为贫穷，小小的肩膀担起了茶园里繁重的劳作，而因为大人社会的利欲熏心，古阿明的绘画天赋不被认可甚至被大力压制。

在外来的美术代课老师郭云天的赏识与帮助下，古阿明拥有了三十六色彩笔，度过了快乐而又短暂的画画时光，天才少年用纯粹的童真画出了他眼中的美。然而面对有权有势的县议员、校长以及老师们共同的打压，郭云天小心翼翼地给古阿明争取各种展示他天赋的机会。最终因不适应学校环境，郭云天苍白无力地



离开乡村，而陷入疾病的古阿明和他的天赋、梦想一起夭折。苍翠青山依旧很美，但童真破碎。

小说中，钟肇政把强大的贫富差距、学校教育的功利化、校园当权者的堕落等社会问题揉进了古阿明短暂的生命中，编织成一首童年挽歌。所以，当郭云天再一次归来，见到的却是他的墓碑时，深深地冲击着故事中孩子们的心灵，县议员的女儿被光明唤醒，古茶妹也得到成长，观众陷入沉思。正如小说中所写：“光明：这儿并不缺少；但唯有有光明，相对地也就免不了有黑暗。光明与黑暗，原是永远同在的啊。”

这个深刻又动人的故事在发表30年后被搬上银幕，成为与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一样“好哭”的电影，但它反映的社

会问题不仅在当时非常直接、勇敢，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会令人扼腕。

《鲁冰花》是钟肇政的第一部长篇，作品出版时他的写作已到了第十个年头。钟肇政192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桃园，七岁起“即被迫学习日语，到了进中学时，校内日常所用语言已全部是日语，迨至中学时代，读写不用说，连思考也全是日文”。因父亲工作和全家的迁居，他年少时求学经历异常曲折。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，钟肇政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，从《千字文》、韩愈散文开始训练自己进入汉语思维与写作。钟肇政1949年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，但因听力障碍无法适应大学而辍学，回龙潭乡下担任小学教师。妻子务农，钟肇政利用寒暑假开始练习写作。1951年发表处女作《婚后》之后，他正式开启了长达一个甲子的写作、翻译生涯。

钟肇政一生笔耕不辍，留下逾2000万字作品，作为中国台湾史诗巨著创作的开创者，他的24部长篇小说中最具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是三组大河小说，即“浊流三部曲”（《浊流》《江山万里》《流云》）、“台湾人三部曲”（《沉沦》《沧浪行》《插天山之歌》）和“高山组曲”（《川中岛》《战火》）。因为作家本身就来自于最底层，所以在他的小说中，对形色各异、不同身份的底层人进行了描绘，比如长工、茶农、卖艺女人、底层警察和教师等，更有大部分作品刻画了抵抗日本统治等悲壮史诗性故事，抒发民族气节。这些作品让钟肇政成为中国台湾乡土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中坚作家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台湾慢慢开放的社会环境下，钟肇政也深受世界经典作家的影响，他大量地阅读卢梭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海明威、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；他痴迷歌德，不仅翻译了《歌德自传》，还以歌德的视角写出《歌德激情书》，用文学之笔编织了歌德

一生回肠荡气的风流韵事，详细探究了歌德在两段不伦恋、忘年恋等感情中的状态。钟肇政还读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，且翻译了三岛由纪夫、安部公房等作家的不少作品。

除了作家与译者的身份外，伴随钟肇政写作身份的另一个身份是编辑。1965年，他开始杂志和图书的编辑、策划工作，策划了《本省籍作家作品选》《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》等，在当时异常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中，为不同流派的作家、作品呐喊。钟肇政也像朱西甯、陈映真一代作家一样拥有提携新人的习惯和传统，经常让年轻的作家住到自己家中，进行创作上的交流指引。钟铁民、苏进强、吴锦发等人就是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走上作家之路的，而他的文学作品也对年轻一代写作者产生影响。

文学的成就、翻译的建树以及在文坛的影响力，让钟肇政继“台湾文学之父”赖和之后，被冠以了“台湾文学之母”的名号。钟肇政文学中的客家写作、殖民写作、伤痕书写保留了民族、家族的历史记忆，成为无法抹杀的中国台湾本土作家。有学者曾写文章称，在文学史上，钟肇政的地位稳如磐石。